

# 西方现代翻译学学派的理论偏向

张柏然, 辛红娟

(1.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3; 2. 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南长沙, 410012)

摘要: 西方现代翻译两大学流派(语言学派和文化学派)各有其理论偏向: 语言学翻译研究使翻译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但过强的功利性容易造成对翻译现象的误释和翻译理论学科的消解; 而文化翻译研究由于与其他学科的紧密联系, 使得翻译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的学科边界变得模糊, 从而使其失去了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可能性。

关键词: 翻译学; 语言学派; 文化学派; 理论偏向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5)04-0501-06

西方的翻译活动,若从公元前3世纪《七十子希腊文本圣经》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问世算起,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自古罗马的西塞罗、贺拉斯以来,翻译学学派林立,学说纷繁。不同时代、不同流派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翻译进行了各自的阐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部西方翻译学史就是一部学派的传承与更替、聚合与交锋的历史。20世纪以前的翻译理论,重点在直译和意译上。20世纪50年代,西方各国开始了对翻译较为有系统的分析,新的争论主要是围绕意义和等值等语言问题;70年代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的出现,标志着翻译研究逐渐脱离了静态的语言类型的分析,代之以功能和交际方法;随后,勒菲弗尔、巴斯奈特等人又从文化角度展开对翻译的研究。本文拟从西方现代翻译理论的两大主流学派即语言学派和文化学派对翻译的描述入手,分析它们各自研究中的理论偏向,以期提高人们对翻译本体论的认识,促进翻译学学科的创建。

## 一、语言学派的理论偏向

随着现代语言学的形成与日臻完善,20世纪中叶以来,建立在语言学(普通语言学或结构主义语言学)基础上的翻译研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在翻译研究领域逐步形成了独具“范式”的语言学派。由于语言学派的努力,翻译研究在学科化进程中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摆脱了“经验陈述”的模式,从而具有科学的特性。

我们可以将语言学派对翻译的研究分为两类: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关于翻译的论述和以现代语言学理论为基础专门从事翻译问题研究的学者的论述。前者立足于结构主义语言学自身的研究,仅将翻译问题作为语言结构分析的个例或研究途径,其有关翻译的论述与其说是翻译研究,不如说是借助翻译来探索语言研究的方法论;而后者在前者范式的指导下,对翻译过程、方法等范畴进行描述,以期得出具有普适性的语言学翻译模式。

### (一) 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关于翻译的论述

布拉格学派的创始人雅可布逊(Roman Jakobson)较早注意到翻译与普通语言学的关系。他认为,作为语符和信息的诠释,翻译是语言学方法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雅可布逊列举了诠释语符的三种方式: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其中,语际翻译就是人们通常所指的严格意义上的翻译。他强调,在语言诠释中语言学对翻译行为有极大的依赖性。

英国语言学家弗斯(J. R. Firth)在《语言分析与翻译》一文中详尽地阐述了结合翻译进行语言分析的观点。弗斯肯定了翻译理论自身在语言学中的地位。他认为,把翻译作为语言分析的一种形式,用来阐明语义,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弗斯认为翻译的存在就是对语言理论和语言哲学的挑战;语言分析与翻译结合可以为语言学家和社会学家提供广阔的研究空间。

在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关于翻译的研究中,韩礼

德(M. A. Halliday)的观点较为著名。他指出句子是翻译的基本单位,翻译过程包括三个阶段:寻找等值物、检验等值物以及调整译语结构。韩礼德研究翻译的出发点是外语教学,对他而言,翻译理论是普通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翻译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对比形式,利用翻译进行语言对比可以使学生注意到两种语言的异同。

我们发现,结构语言学家在讨论翻译问题时,往往将翻译研究纳入语言学理论研究的框架,以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来描述翻译现象。他们研究翻译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便利语言研究。将翻译研究作为个例以补证语言学理论、突出翻译研究的工具性功能是语言学翻译研究第一类文献的共同特征。这类翻译研究由于其语言研究功能的前设性,直接导致其研究的理论偏向——研究的工具性目的,因而影响了其结论的普适性,给翻译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局限。海德格尔认为,前设和前有、前见一样,是任何解释的基础,它们一起构成了理解的前结构,事物的作为结构出自理解的前结构。前设即运用一个观念来弄清作为结构。当我们面对研究对象时,总是对它预先做出假设,然后才能把它解释成“作为”某物<sup>[1](759~760)]</sup>。任何解释都包含了某种假设,问题在于这种前设的客观性。上述语言学家从普通语言学出发,以结构主义范式观照翻译问题,其理论视角本身无可厚非。然而,这种研究具有明确的功利性:将翻译研究视为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结论的补证,将翻译理论视为语言学研究的途径或手段。这种以工具性目的为前设的翻译研究必然导致研究结论的理论偏向,从根本上否定了翻译理论作为学科的建构。法国语言学翻译理论的代表人物穆南(G. Mounin)从另一侧面揭示出语言学翻译研究第一类文献的特性:研究翻译问题的语言学家至少在最初阶段不要将翻译作为弄清某些普通语言学问题的手段,而应该运用语言学,特别是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为译者解决翻译问题提出可能性。

## (二) 以现代语言学理论为指导的翻译学家的研究

以普通语言学理论或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为指导的翻译学家,大多认为翻译是特定形式的言语行为,对翻译性质、过程和方法的分析和描述必须要用语言学的基本概念、范畴和方法。从广义上看,索绪尔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创始人。他认为,一切符号都可以分为能指和所指,语言的研究可分为共时性研究和历时性研究。索绪尔十分重视对特定时期语

言横断面的共时性研究。索绪尔的语言学模式是以共时性研究为基础的,将语言与言语加以区别的语言体系,这个体系由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构成语言中的差别体系<sup>[2](100~176)]</sup>。继索绪尔之后,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强调语言学研究对象是语言能力而非语言现象。他将语言分为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提出短句结构规则和推导模式以说明他的结构与转换的方法。

以现代语言学理论为指导的翻译学家均以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的某种语言模式作为其理论基础,如奈达(E. A. Nida)以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为基础,提出由原语结构转换成译语结构的核心句模式,而卡特福德(J. C. Catford)则以韩礼德的系统语法理论为其翻译研究的基础。

奈达将翻译过程分为分析、转移和重组(analysis, transfer, and reconstruct)三个阶段,即:首先分析原作语言的信息,将其剖析成结构上最简单明了的形式,在此基础上转移,然后再重新组织成正常的译作语言。他强调,对原语语言进行分析时,不能局限于语言单位间的句法关系和这些语言单位的外延意义,文体风格在信息传达中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转移阶段,奈达就语言的意义非对应现象——喻体差异、喻体缺省、语义缺省等提出了翻译对策,针对内涵结构和外延结构,提出了转移外延内容的全新组合、分解组合和综合组合。奈达认为,重组过程主要涉及形式范畴和功能范畴,前者要求根据文体风格和文学体裁进行重组,后者则要求关注读者的接受。实际上,奈达在语义层面上的翻译对策,其核心就是语言对比分析和寻找语义对应。

卡特福德遵循与奈达相同的翻译理论研究模式,他认为翻译的中心问题是在译语中寻找等值物,翻译理论的中心任务则是描述翻译等值的本质和达到翻译等值的条件。卡特福德的理论核心在于提出实现等值关系的途径:等值关系可以由“层面”(语法形式和词汇形式、语音实体和字形实体、语境)到“等级”(句子、子句、词组、单词、词素)在任何一个交叉点上建立。如果在较低的某一等级上不能确立等值关系,可以在较高等级上求得。卡特福德的翻译研究仍然立足于语言分析,即界定等值成分的本质和条件。

以语言学理论为指导的翻译学家的研究认为,在具体翻译过程中,翻译家对原语本文接受的结果——深层结构的表述最初是由核心结构(核心句)来实现的。而所谓核心结构则指对特定深层结构最

基本、最具代表性的表述形式。这类研究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即核心结构在其完形的初始,已经导致意义的缺省。事实上,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翻译家对深层结构的把握是通过“统觉”来实现的,翻译家直接在译语中找寻与这种“非语言”或“超语言”的结构相对应的译语表层结构,然后根据原文的深层结构对译语表层结构进行语义修正并完成译语文本的建构。“非语言”或“超语言”的结构通常表现为意义指向(在应用性文本中)和心理意象(在艺术性文本中)。翻译家的基本任务是通过译语语言对意义指向和心理意象进行表述和修正。

奈达的翻译理论,尽管在分析阶段和转移阶段表现出结构特性——层级性或步骤性,但并未使翻译过程得到客观的、经验性的描述。这种翻译模式即使作为教学型模式也不具备可操作性。同样,卡特福德的理论也缺乏得以实现翻译等值的可操作性。他的翻译模式的核心在于界定等值成分的本质和条件,认为等值关系可以在由“层面”到“等级”的任何交叉点上建立。他的论述与其说是对翻译模式的设定,不如说是在比较语言学范式中探求双语对应的可能性。卡特福德虽然在主观上力求以结构主义语言学为基础对翻译问题进行详尽的探讨,但实际上在探讨翻译的过程中,他不自觉地偏离了翻译研究,而展开了对双语的静态分析与比较。

以语言学理论为指导的翻译学家的研究一般始于语言(双语)的结构分析,诸如语言层次的划分、话语实用关系类别以及话语功能类别的确定,经由翻译单位的选定,最终规定翻译具体操作方法。这种方法在语言学翻译研究中通常表述为模式、方法和步骤等。如果说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对翻译的研究是基于语言学自身研究的需要,即功利性目的而对翻译现象进行分析,其结论给翻译研究带来极大的局限,从根本上否定了翻译理论作为学科的地位;那么,以语言学理论为指导的翻译学家的研究则是基于又一功利性:为实现译文“等值”或“等效”的实用性目标的观照下,同样得出具有理论偏向的模式。

综上所述,语言学派或以翻译研究作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研究自身的途径和手段,或在结构主义语言学观照下对翻译过程作静态的语言分析。语言学翻译研究以其对翻译过程的描述而获得了科学性或客观性,应当指出,这种对“过程”的考察,实质是对方法、模式的操作程序的设定,和所有规范选择一样,它的研究结论带有浓重的经验色彩。真正意义上的翻译研究并没有因语言学的加盟而获得具有

学科意义的进步。语言学翻译研究的核心是如何实现等值或等效,始终不过是对翻译方法(翻译模式)的探索,这一学派的翻译研究存在着理论偏向。虽然交际理论、社会符号学的引入使得这一理论偏向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修正,但是,语言学翻译研究的偏向始终存在着。这种理论的偏向合理地推导出对翻译现象的误释,以及对翻译理论学科的消解。

## 二、文化学派的理论偏向

传统哲学的研究是从不同中找出同一性,从现象中找到本质。柏拉图最早提出这种理论,认为哲学的任务是从变化中找到不变。黑格尔是这一理论的集大成者,认为哲学是从具体世界中抽象出一般性。而现代哲学转向现实、具体,也就是超越当前,寻找背后的根源,即背后的现实。这背后的现实是隐蔽的现实,是产生当前现实的背景,是不在场的东西,然而却是现实的,不是抽象的。传统哲学的研究是从现象到本质,现代哲学的研究却是从(当前的)现实到(背后的)现实。

正是在这种哲学研究转向的大背景下,20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突破了语言学研究的藩篱,转向研究翻译现象与文化的关系。翻译的文化研究试图探索译语文化通过翻译对原语文化的接受、翻译结果对译语文化的影响、译入语文化对翻译活动的影响与制约、文化差异在语言中的反映等问题。根据研究的对象以及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翻译的文化研究可以细分为多元系统学派和“翻译研究”学派。我们试图通过对这两种研究倾向的分析来说明,翻译的文化研究模糊了翻译研究的学术边界。

### (一) 多元系统论及其对比较文学的偏重

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认为,在一种文化内形成的翻译高潮不外乎三种情况:第一种是某一民族或国别文学处于发展的初期;第二种是该文学觉得自己处于边缘或“软弱”,或者两者兼而有之;第三种是该文学处于某种转折时期或一种文学真空时期<sup>[3](117)</sup>。这样,该理论把翻译行为与文化的弱势和强势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多元系统论无意对文学翻译作任何价值判断或指导,而是把翻译的结果视作一种既成事实,进行研究以探寻决定和影响翻译文本的各种因素。

多元系统论的另一支持者图里认为,过去对翻译问题的研究过多地局限在关于可译性、不可译性

等问题的讨论上,而太少关注、甚至忽视对译文文本和对译入语语言、文学、文化环境给翻译造成的影响等问题的研究。图里将注意力集中在翻译的结果而不是翻译的过程上,认为翻译更主要的是一种受历史制约的、面向译入语的活动,而不是纯粹的语言转换。因此,他对仅仅依据原文而完全不考虑译入语因素(与原语民族或国家完全不同的诗学理论、语言习惯等)的传统翻译批评提出了批评。他认为,研究者进行翻译分析时应该注意译入语一方的参数,如语言、文化、时代等等。这样才能搞清究竟是哪些因素,并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翻译结果。

多元系统论把翻译结果作为研究对象,研究文学翻译与整个文学体系和文化体系的关系及其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其实质是研究译入语文化对以翻译为媒介的外国文学的接受问题以及该翻译文学对译入语文学和文化的影响问题。

外国文学的接受问题实质上是一个文学史问题,确切地说,是比较文学的问题,主要研究一个民族在接受外国文学时接受什么、怎样接受、接受的效果以及接受过程中的各种因素和现象。这种接受可分为民族接受和个人接受两个方面。个人接受和民族接受在方式、内容和效果等方面存在着差异,但它们之间又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个人的文学接受可以说是民族文学接受的具体体现,因为个人接受外来文学影响,必然是在本民族的文化背景、心理积淀和现实需要等大的氛围中进行的,必然受到这些全民族的“集体无意识”的制约。

一个接受者,无论是个人还是一个民族,都必有其先在的文化习惯、概念系统和对事物的判定与假定,这些都构成新知识接受时的主观上的前提。当他在接受外来影响时,总是尽力把自己接触到的东西纳入自己的“前结构”中,以满足自己心理上的期待或求知的需要。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心理积淀就是本民族在接受外来影响时的“前结构”。外来的影响必须通过这一层民族主观的过滤和染色,才能进入本民族的文化中。民族文化和心理传统作为一种民族的主观因素在文学的民族接受中发挥着潜在的作用,它往往隐而不露,较为深藏,较为间接。由民族当前的社会状况所决定的民族需要,也是民族的期待视野的重要内容。民族的现实需要在表面、直接和外在的层次上制约着接受,常常左右着一个民族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价值判断和审美判断。

文学翻译家是民族文学接受中的民族主观的体现者。而民族主观最直接的体现是语言,翻译文学

是用接受者民族的语言来表达的文学。民族语言的时代特性和使用者(翻译家)的风格特征,排斥了翻译的纯客观性质。翻译的选题问题,译什么的问题,也体现了翻译家在文学接受中所表现的民族主观因素。在民族文学的接受中既然有着许多主观因素在起作用,就必然会潜伏着片面性和错误的可能,因为在任何一次认识中,主观和客观完全一致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样,由于民族的主观和文化上的差异,造成了文学接受上的“误读”。

翻译结果对译语文化的影响研究通常是以既往的翻译对文化的意义、作用为研究对象,例如对下述现象的研究:中世纪阿拉伯人翻译的古希腊典籍和中国汉晋、南北朝以至唐宋时期的佛经翻译。古希腊典籍的翻译不仅推动了阿拉伯学术研究,而且保存了古希腊文化精萃,使后来的欧洲学者得以从阿拉伯文中将这些希腊典籍译成拉丁文,促进了欧洲的学术研究;佛经翻译不仅给中国传入了一种宗教思想,更从哲学思想、文学思潮、创作题材以及语言、文体等方面给中国文化带来影响。质言之,这类研究探讨译语文本给译语文化带来了什么影响。且不说翻译文学对译语文化的影响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内容,通过对实施影响的主体进行界定,我们也可以明了研究范围的归属。比如,由于佛经的翻译,中国文学在文学内容和体裁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实施影响的主体到底是什么呢?是佛经本身还是翻译?当然,影响中国文学并使之发生变化的是佛经本身,而翻译只是实施影响的媒介。

实际上,影响译语文化的主体是十分复杂的。通过分析“翻译结果”这一概念,我们可以发现影响译语文化的主体的多样性。翻译结果是译者通过自己的主观理解对原作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体用译语语言的表达。如果说翻译结果对译语文化造成了种种影响,那么产生影响的主体是不同的。一部分影响的产生是由原作带来的,如文学思潮、哲学思潮、文学体裁的变化等等。翻译在这些影响的产生中只起了媒介作用。换言之,在接受者精通外语的情况下,原语作品可以直接影响接受者并产生相应的影响。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产生是由于佛经本身富有想象力的结果(参见:胡适《佛经的翻译文学》);外国文学对“五四”文学观念的影响是由于外国文学本身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决定的。另一部分影响则和翻译本身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由于翻译造成的译入语语言形态和文体的变化。梁启超曾对佛经翻译对汉语词汇、语法及文体的影响作过深入研究。他指出佛

经文体在遣词造句、句子结构、文体风格等方面迥异于当时的语言常规,认为佛经翻译造成了“国语实质之扩大”和“语法及文体之变化”。(参见:梁启超《翻译文学与佛典》)译语表达形式的变异是由翻译造成的,这种影响推动了译入语语言的发展。近现代文学翻译对现代汉语形成的影响即属于这一类。还有一种影响来自译者,由于译者对原文的“误读”(指文化上的,而非由于译者语言水平的低下或疏忽而造成的翻译错误)和主观故意(删节、篡改、增加等)而对译文文化造成的影响。综观上述三种影响,我们可以看出,第一和第三种影响并非翻译所造成,因而不属于翻译研究的范围。只有第二种影响才属于翻译研究的重要内容。

## (二) “翻译研究”学派与媒介学的渊源

“翻译研究”学派(Translation Studies)关注特定时代的翻译活动的模式和翻译对译入语国的语言、文体、文学类型等的影响。该学派重视对译者发表的与他们所译作品有关的前言、通信、宣言的研究,主要代表人物是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勒菲弗尔重点考察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翻译和制度、学说、政府、学术界支持以及私人企业资助等多方面的关系,由此触及了翻译的政治经济基础。勒菲弗尔认为,翻译是对原作的一种“折射”(refraction)或重写(rewriting)。这些重写文本在一些限制性条件下得到制造:①意识形态或世界观;②诗学,一种把若干主旨结合起来的基调或在某个特定时期特定地域占统治地位的象征和文学态度;③论域,或作者在写作时能想到的物体与观念的总和,而且这些物体与观念对作者与读者来说都具有相同意义;④语言。充分具备这些条件的译者就能成为创造性的艺术家<sup>[4](214~218)]</sup>。

“翻译研究”学派的代表人物勒菲弗尔和巴斯奈特都是比较文学研究专家,他们关于翻译的许多理论都是基于比较文学的研究需要而提出的。下面我们将叙述一下比较文学的媒介学所研究的内容,以资与“翻译研究”学派的研究相对照。

比较文学的媒介学是关于一国文学对另一国文学、一位作家对另一位作家产生影响的途径和手段的研究。其研究的重要内容就是译本和译著。比较文学对译本的研究包括原文和译文的对比,其目的是考察译本是不是“完全的”、“准确的”。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常常对原作进行删除、增加、意译、改变形式等。这些做法除了译者的怠惰和任意之外,往往是出于下列原因:考虑读者的口味;顾虑某些猥亵

的描写太露骨;政治或宗教上的原因等。许多译作是不准确的,有些是由于译者缺乏必要的语言知识或责任心,而有些是由于译者故意迎合接受者的趣味。当一部作品被同一种语言译成若干个译本时,译本的比较便成了比较文学的重要题目。(刘介民,1993:266)为了了解译文的特点,往往需要对作为媒介者的译者进行了解:他们的传记、他们的文学生活、社会地位等等。译者的“序言”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宝贵资料。对这些资料的比较与鉴别,可以帮助研究者了解:翻译者的个人思想以及他所采用的翻译体系,他对原作者的态度,外国作家被移植到本国中的历史经过等等。

通过对媒介学的描述,我们发现,“翻译研究”学派所从事的研究是在比较文学的框架下进行的,它力图解决的问题正是比较文学所要解决的问题,使用的也正是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

## (三) 文化翻译学派的理论偏向

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提出了一系列在原先的文学研究者看来似乎无关紧要的问题,诸如为什么一些文化被翻译得多而另一些文化却被翻译得少?哪些类型的作品会被翻译?这些作品在译语体系中占何地位?在原语体系中又占何地位?两相比较又有何差别?我们对特定时期翻译的惯例和习俗知道多少?我们如何评价作为一种创新力量的翻译?译者对他(或她)所翻译的作品有哪些想象,而这些作品又是如何被形象地表达出来的?等等。这些问题的提出,使翻译这一现象同译入语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多元系统论把翻译结果作为研究对象,其实质就是研究外国文学的接受和翻译文学对一国文学、文化的影响,属文学史中的比较文学的范畴。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主要探索原语和译语两个体系中的作者、文本和文学标准之间的关系。勒菲弗尔的研究触及了翻译的政治经济基础,巴斯奈特突破传统观点,认为翻译的单位不是词、短语、句子或语篇而是文化,她说翻译就是为了满足文化的需要和一定文化里不同群体的需要而进行的文化内部与文化之间的交流。他们的研究虽与翻译有密切的联系并给翻译带来新的启示,但并不属翻译理论的本体论范畴。

通过对翻译的文化研究的观点和方法作全面考察之后,我们发现,由于翻译的文化研究与其他学科的紧密联系,使得翻译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的学科边界变得模糊,从而使其失去了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可能性。这是因为,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领域和统摄范围,都有在学科群体中所占的位

置或坐标点,都有相对而又比较确定的学术界线。正是这门学科所属的研究领域和适用范围,正是这门学科所处的位置和所划定的界线,规定着这门学科的对象、性质、任务和方法。因此,研究边界的确定是该研究领域成为独立学科的前提。从翻译研究的学科建构出发,我们认为,翻译的文化研究在翻译研究目标下无限扩大翻译研究对象的外延,使其学术边界模糊,从而使翻译研究的学科建构失去可能。质言之,翻译的文化研究回避了翻译的本体研究。

### 三、结论

综观整个翻译思想史,我们发现翻译作为特定形式的文化活动,虽以双语的互动性转换为表征,但这并不意味着翻译仅仅局限于某种语言操作或语言活动。这种以语言为中介的双语互动或文化互动现象,以及由此导致的语音、语词、语法、文体等变异现象,决非语言学理论所能涵盖的。所以,现代语言学理论必然为翻译研究带来空白,从而造成语言学翻译研究的理论偏向。翻译研究的基点应为语言的差异性,亦即双语的非等值性。结构主义语言学对翻译中原语和译语之间并合现象(不同语言的共同之处)的认同表明,该研究偏离了翻译研究的本质;同时,它对于对策的选定和解释又使该理论带有强烈的功利性,仅成为教学研究或应用研究。对一个学科而言,舍弃基础理论研究而进行应用研究,其结论

的偏向性是不言自明的。

而对翻译的文化研究及各流派的分析,可以看出,翻译的文化研究的许多领域虽然和翻译有某种联系,但这些领域已不是翻译的本质方面。由于翻译与语言、文学、文化、心理等现象的紧密联系,翻译的文化研究的诸多研究是在相关学科的框架下进行的,其结论也只能是相关学科结论的验证或补充。至于与翻译研究的关系,它们至多算得上翻译研究的外围研究。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此并不想否定语言学翻译学派和文化翻译学派的学术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它们的存在自有其存在的原因和理论追求,而且西方翻译学的繁荣也证实了它们在学科发展上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中国翻译学界的理论研究,不应当仅仅从事简单的理论搬运和移植,而应当带着批判的眼光,借鉴西方翻译学已取得的成果,以推动中国翻译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 参考文献:

- [1] 刘放桐. 现代西方哲学(下)[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 [2]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 [3] Gentzler, Edwin.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 [4] 李文革. 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 On the oretical deviation of modern schools in western translation studies

ZHANG Bo-ran, XIN Hong-juan

(1.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2.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75,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briefly discusses the two main school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 West. On affirming their constructive ideas in the translation field, this paper present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ir theoretical deviation. The linguistic schoo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sheds scientific light, but its utilitarianism may well result in misinterpreting translation phenomena and may hind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iscipline; whereas the cultural schoo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may cause a confusing disciplinary boundary and a slim chance of becoming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due to its too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relevant disciplines.

**Key words:**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linguistic schools; the cultural schools; theoretical deviation

[编辑:颜关明]